

王一清,匡远配. 农地流转如何影响农户生计:基于双 IS 框架[J]. 江苏农业科学,2018,46(23):427-431.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8.23.104

农地流转如何影响农户生计:基于双 IS 框架

王一清, 匡远配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湖南长沙 410128)

摘要:农地具有功能多重性,农地流转将产生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变革,必然对农户的生计产生影响。为了从整体上衡量农地流转经济活动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从农户生产生活 2 个方面构建了双 IS 理论框架,考察了农地流转活动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弹性分析法对 2007—2016 年中国农地流转和农民收入的宏观数据进行弹性计算,进一步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具体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弹性效应都不高,即农地流转对改善农户生计状况作用有限。因此,在推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继续加强财政支农力度,建立健全农业服务体系等一系列配套措施,进而改善农户生计,实现农业转型和农户生计改善“双赢”。

关键词:农地流转;农户生计;双 IS 框架;弹性效应

中图分类号: F30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8)23-0427-04

农地是农户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具有生存功能、生产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关系到农户生计^[1]。伴随着农民工大规模涌入城市和新型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农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2011—2015 年间中国农地流转面积从 0.152 亿 hm^2 增长至 0.298 亿 hm^2 。鉴于农地具有多种功能,农地流转面积的扩大将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多重变革。相关学者基于微观数据研究的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的生计产生了正向影响^[2]。那么,基于微观数据得出的相关研究结论能否得到宏观数据的进一步支持?如果二者一致,说明现行政策运行良好;如果二者不一致,说明还需要出台相关措施配合农地流转改善农户生计。因此,笔者基于农地流转 2007—2016 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双 IS 理论框架,从宏观视角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作用机制以及效果,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结论和相关对策建议。

1 生计概念与理论框架构建

Chambers 等指出,生计是谋生的方式,包含了为谋生所需要的能力、资产以及所从事的活动^[3]。Bebbington 指出,生计资本是农户开展生计活动、选择生计策略的重要基础^[4]。代富强等使用 SLA 框架提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的指标体系^[5-6]。农地作为农户的自然资本之一,其使用方式的变化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生计产生作用。农地流转通过改变要素配置效应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产生重要影响^[7],进而引起农户生计活动的种类、构成的变化,导致农户生计结果的差异。对于农地流转如何影响农户生计,学术界看法并不

一致。相关研究表明,农地流转正向影响农户生计,农地流转有可能促进农业要素有效流动,改善资源配置,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从而改善农户生计状况。赵立娟等应用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运用内蒙古 4 个区 380 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研究表明,农地流转有利于自然资本禀赋较低的农户实现从农业生产部门向非农业生产部门转移,进而实现农户收入的多元化,从而能够有效促进农户生计转型^[2]。张会萍等对宁夏银北地区老年人生计问题的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对老年人的生计结果具有正向促进效应^[8]。相关研究表明,农地流转负向影响农户生计,农地流转可能导致农户失去就业机会,致使其生活水准下降,从而不得不面对多种风险冲击。孙新华指出,强推型农地流转将农户与土地剥离,对绝大多数农户的生计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9]。Frischtak 指出,政府对农地市场的过度干预不仅导致了市场效率低下和农户农地利益受损,也将会影响农户长期生计^[10]。贺雪峰认为,资本下乡导致的农地流转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损害了农户的利益^[11],如果政府仅把农地视为一种经济要素而着力推动其流转,大量农民将有可能失去农地承包经营权,不利于农户生计改善。

基于上述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相关讨论,本研究将考察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其影响机制,并将进一步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程度。农地流转通过农户的生活质量和农业生产状况 2 个方面影响农户的生计。一是农地流转既直接影响农户生计,也通过影响农户的收入和社会保障等间接影响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从而影响农户生计。农地流转直接的影响是农民的生计多样化指数提高了,生计多样化降低了农业生产的风险和农户生产经营的脆弱性,正向促进农户生计。二是农地流转也通过影响农户农地投资水平和农业规模化经营间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状况。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笔者在生活方面选取农户收入、社会保障来表征农户生计,在生产方面选取农户投资、规模经营来表征农户生计。因此,可以从生产生活方面整合 4 个指标构建农户生计分析框架(即双 IS 框架),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机制,

收稿日期:2018-06-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473080);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编号:14A065)。

作者简介:王一清(1993—),女,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E-mail:1147432096@qq.com。

通信作者:匡远配,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E-mail:kyp0008@163.com。

并测度影响力大小(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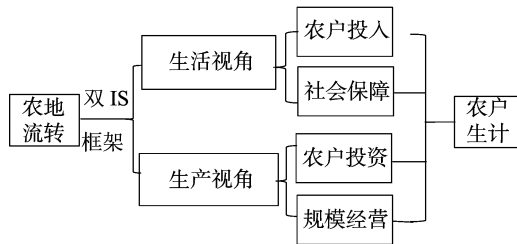


图1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分析框架

2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影响的假说提出

2.1 生活的视角

2.1.1 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对于农地流转能否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学术界一直存在 2 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农户通过土地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微乎其微,土地流转并没有提高农民收入。农地流转使得纯农户和兼业户的农民收入被剥夺^[9],其生计策略相对单一,脆弱性和风险较大。资本大规模介入的不可逆的土地流转使农民退无可退,不仅没有带来农户收入的增加,反而使得农户农业收入降低,导致生活水平滑坡。获取收入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导致农户的收入水平波动剧烈。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村土地是“沉睡的资本”,激活它对经济发展和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至关重要。朱建军等运用反事实的分析框架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得出与未流转农地的农户相比,流转农地的农户所获得的收入增加^[12]。王春超研究表明,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其农业收入减少了,但总体收入增加了,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渐增加^[13]。相关资料显示,农户收入增加并且呈现多元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工资性收入成为主要来源。农地流转租金提升了其财产性收入,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正向并且显著的促进作用(表 1)。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说 1:农地流转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对农户工资性收入作用大于家庭经营性收入。

表 1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

年份	收入结构(元)				
	人均纯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2010	5 919.0	2 431.1	2 832.8	202.2	452.9
2011	6 977.3	2 963.4	3 222.0	228.6	563.3
2012	7 916.6	3 447.5	3 533.4	249.1	686.7
2013	8 895.9	4 025.4	3 793.2	293.0	784.3
2014	9 892.0	4 152.2	4 237.4	222.1	1 877.2
2015	10 772.0	4 600.3	4 503.6	251.5	2 066.3
2016	12 363.4	5 021.8	4 741.3	272.1	2 328.2

注:资料来源于 2011—2017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1.2 农地流转对农户社保的影响 在小农模式下,农地具有农业生产与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直接关系到农民利益的保障程度。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可能会提高农地的社会保障程度,二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也可能会降低农地的社会保障程度^[14]。农地流转对农户社会保障的实际影响到

底如何?主流思想认为,当前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包含土地和家庭保障为核心的多元化体系,农地承担了农村社会保障相关功能,且该功能远大于其生产功能。具体而言,农地流转租金有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进而提高其保障程度。因此,农地带给农户的保障作用在总效用中占主导地位,但长期的农地转出会使农地对农民的养老保障受到冲击。在当前农地流转不畅,农民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双重困境下,农地流转未能有效解决失地农户的社会保障问题。成都的“双放弃”、嘉兴的“两分两换”、重庆的“土地换户口”等为代表的农民城镇化承包地退出试验并不是太成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致使政府无法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给农地转出农户。目前农户的农地生计依存弱化,农地的保障功能主要通过就业保障得以实现,一旦劳动能力与生产资料不能很好地相结合,将会使农户的社会保障受到挑战。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说 2:农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农户的社会保障水平,但效果不明显。

2.2 生产的视角

2.2.1 农地流转是否有利于优化农户投资 加快农地自由流转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机理潜藏着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合力。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提升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的投资,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农地流转能够通过改变土地规模和土地利用方式影响农业生产结构,进而影响农业投入结构和水平。农地流转还可以鼓励资本更多的对农地进行投资,有助于实现农地价值^[15],农业资本投资不仅能够提高农业产量和土地生产率,还不会损害小农的利益。二是农地流转市场和农地金融的发展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农地流转将诱导家庭内部的农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配置和农地在农户之间配置。三是农户对农地使用权稳定性预期越高,农户对农地上有机肥的投入越高^[16]。也有观点认为,农地流转频繁使得农地经营权不稳定,导致农户对农地的投入激励下降。农户之间非正式的土地流转可能不利于激励农户在现期增加对流转土地的长期投资。但随着推进农地的确权、登记和颁证工作以及促进农地流转合同的形成和规范等政策措施都可能会提高农民对农地的投入^[16]。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说 3:农地流转有利于优化农户投资。

2.2.2 农地流转是否促进农业经营规模化 农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和农业经营的适度规模发展,是保障农民权益、实现农业现代化和稳定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农地流转有利于推动农地向“种田能手”转移,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实现了农地的集中化经营,带动了粮食增产和农业增效。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迅速发展,现阶段土地流转处于起步阶段,农地所有权界定不清和土地流转中制度不完善和操作不规范等现象,不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需要引导农地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从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实现“三个相适应”,否则农业规模经营必然与目标背道而驰,监督成本的上升抵消农业规模经营效益,政府强制塑造的“虚胖大户”面临农业风险,可能造成农地转出户的损失。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说 4:农地流转促进了农业经营规模化,但动力不足。

3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测度

3.1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影响弹性公式的引入

运用弹性理论,本研究计算农地流转对农户的收入、社会保障、农业投资以及规模经营的弹性系数,即农地流转面积(X)变动的百分比与其引起的 Y_i 变动的百分比的比值。一般用 E 表示,其公式为:

$$E_i = \frac{\Delta Y_i / Y_i}{\Delta X / X}.$$

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衡量收入水平,用农村社会救济占民政事业费支出总额比值指标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用农户固定资产投资衡量农业投资水平,用人均耕地面积来衡量农业规模经营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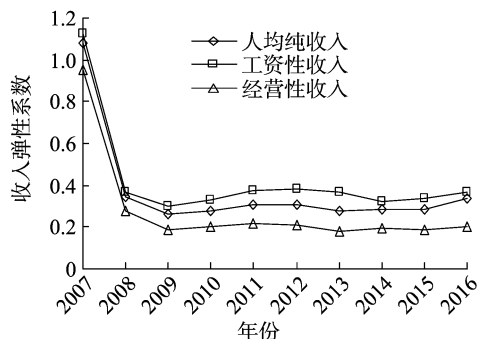
式中: E_i 表示弹性系数; Y_i ($i=1,2,3,4$) 分别为收入、社会保障、农业投资以及规模经营相应指标值; E_i 的符号用来判断方向,绝对值用来衡量弹性测度的大小。

3.2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影响的弹性测度:基于生活视角

3.2.1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弹性测度 利用弹性理论分析当农地流转面积增加时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化程度,即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动的百分比除以农地流转面积变动的百分比。基本结论为:(1)农地流转对收入的弹性为正且缺乏弹性。计算 2007—2016 年收入的弹性系数,从表 2 可以看出,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弹性系数符号都是正的且 $E_1 < 1$,是缺乏弹性的,即随着农地流转面积的扩大,农民收入也递增,但增加的幅度较小。农地流转面积每提高 1%,农户人均收入将会增加 0.141%,本结论与钟国辉的研究结论不同,钟国辉认为,农地流转面积每提高 1%,农民人均收入将会提高 0.011%^[17]。同时,农地流转对收入的弹性总体上存在“L”形变动趋势(图 2)。原因可能是农民的技能较低,农地流转后农户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就业机会;农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过程缓慢,农产品存在“卖难”影响农民增收。同时,弹性呈现波动发展的态势,原因是农村居民收入受到多元化、多重因素的影响,所以并非与农地流转面积成线性关系。(2)农地流转对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的弹性为正,都缺乏弹性。无论是工资性收入还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农地流转对其弹性也存在“L”形变动趋势(图 2)。2008 年以后,因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速下降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农地流转面积每提高 1%,工资性收入会提高 0.458%,经营性收入会提高 0.312%。相对而言,农地流转对于工资性收入促进效果明显大于农业经营性收入。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没有工资性收入大。

3.2.2 农地流转对农户社会保障的弹性测度 农地流转对农户的社会保障产生直接影响,影响程度可通过农村社会救济占民政事业费支出总额比重的弹性进行测度。从图 3 可以看出,农地流转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弹性大体上呈现出倒“U”形的变动趋势。总体而言,农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农户社会保障水平,尽管这种保障水平不高且较不稳定。(1)2009—2011 年农地流转对 E_2 的弹性系数为正,说明农地流转面积的增加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原因是刚开始推进农地流转制度时,拥有较高非农就业优势的农户,对农地流转的意愿较强,工资性收入和地租收益能够降低非农就业不稳定带

来的风险。因此,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弹性是增加的。(2)农地流转面积的增加没有实现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的同步发展。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弹性系数从 2011 年开始下降,且下降速度加快,随着农地流转快速推进,特别是政府强制推动农地流转模式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滞后于农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农地流转后农户的后续生计问题日益凸显。同时,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发展,转出农地农户的城市就业受到影响,返乡创业人口增加;尽管 2014 年国家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不同步,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农村人口的老齡化加剧,加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负担。虽然弹性系数在下降,但 E_2 的弹性系数为正,说明农地流转使得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得到提升,但提升效果不明显。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不足以补偿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而且现阶段农地依然是农村居民抵御风险最基本、最可靠的保障。



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图2 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弹性系数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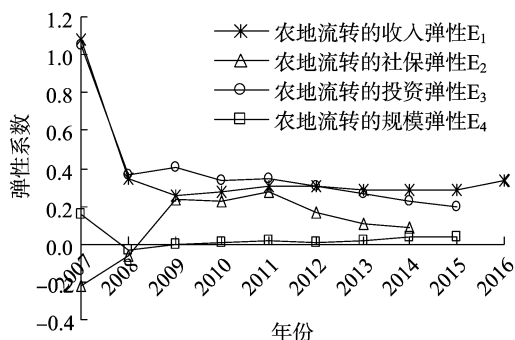


图3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各指标弹性系数趋势

3.3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影响的弹性测度:基于生产视角

3.3.1 农地流转对农户投资的弹性测度 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投资的影响程度可以用农地流转对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来衡量。从表 2 可以看出,农地流转对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符号为正且 $E_3 < 1$,说明农地流转增加了农户固定资产投资,但是缺乏弹性,即农地流转面积增加的幅度大于农户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幅度。同时农户投资的弹性系数基本上是下降的,其原因一是农地产权的不稳定,颁证确权工作进展不快,导致农户对农业投资稳定性预期不确定,农户固定资产的投资难以保证得到回收和补偿,农户投资的拉动力和刺激性不足。尽管中央文件反复强调赋予农户长期而稳定的农地产权,但土地承包合同发放率并不高,如马贤磊等研究,苏、鄂、桂、黑 4 省(区)的农户土地承包合同签

订率仅维持在 70% 左右^[18]。二是国家农业公共投资不足,影响了农户农业投资。2003 年以来,政府加大了农业投资力度,但直接农业投资推动力减弱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且政府财政诱导型的职能发挥不够,在一定程度上没能有效催动社会资本进入农业产业^[19]。

3.3.2 农地流转对农业经营规模的弹性测度 利用人均耕地面积的弹性系数衡量农地流转对农业经营规模的影响程度。从表 2E₄ 可以看出,2008—2009 年农业规模经营的弹性系数为负,农地流转面积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原因一是农地流转是人情租为主,只是农地的“友情托管”,并没有实现农地整理,“挑肥拣瘦”,甚至抛荒;二是仍然保留小农种植方式,没有达到适度规模经营的阈值。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是阻碍农业规模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是在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土地单位面积的产出随着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因此农户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动力不足,规模效益不明显。2010 年以来,E₄ 弹性系数基本为正,且 E₄ < 1,说明农地流转确实使得农业经营规模增加,只是弹性系数较小而已。原因是国家出台《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和《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使得农地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政策、有组织、有效果;土地股份合作社数目增多,且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规模经营农户数量继续增加,土地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实现了专业化、集约化的农业规模经营,农业规模经营效率也得到提高。

表 2 2007—2016 年全国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影响程度的弹性计算

年份	农地流转 面积 (亿亩)	农地流转 的收入 弹性 E ₁	农地流转 的社保 弹性 E ₂	农地流转 的投资 弹性 E ₃	农地流转 的规模 弹性 E ₄
2007	0.64	1.079	-0.217	1.048	0.163
2008	1.09	0.346	-0.059	0.361	-0.029
2009	1.50	0.260	0.233	0.403	-0.004
2010	1.87	0.278	0.226	0.332	0.009
2011	2.28	0.308	0.275	0.341	0.014
2012	2.78	0.305	0.171	0.307	0.016
2013	3.51	0.281	0.105	0.261	0.040
2014	4.03	0.284	0.087	0.230	0.037
2015	4.47	0.287		0.193	0.037
2016	4.60	0.339			0.040

注:农地流转面积数据来自土流网,人均耕地面积 = 耕地面积/农村人口数,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 亩 = 667 m²

总之,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是决定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的直接因素。通过测算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影响的弹性效应可以得出:(1)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弹性效应都不高。弹性系数基本都是小于 1 且缺乏弹性,即农地流转带来的促进作用并不理想。虽然农地流转的速度很快,但农地流转的质量和效率不高,大部分农地流转都是在朋友、亲戚、熟人之间自发流转,并且流转规模小。农地流转市场的不完善、农地流转合同签订的不规范以及农地产权不清晰等问题影响着农地流转的质量和效率。(2)从生产生活 2 个方面,农户收入、社会保障、农户投资以及规模经营 4 个层面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4 个维度是有差异的。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以及农户投资的影响程度大于其对农村居民社会

保障以及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程度。因此,农地流转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农民、农村、农业的同步转型,农地流转对“三农”转型的效应应具有非均衡性^[20]。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农地流转促进了农民增收,但增收效果不明显。对于农户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效果要强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收效果。农地流转对农民的生活、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影响呈倒“U”形趋势。农地流转虽然促进了农业经营规模扩大,但效果不明显,农地流转促进了农户对农业投资,但须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投资,来促进农户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有效促进农地流转改善农户生计,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在完善农地流转制度的过程中,制度设计者应更关注农地流转后农户的生计问题,给予农户稳定持续增收的制度安排,如加强对农户的就业培训,加快农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配套措施。(2)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推动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同步发展。构建农地流转适应性的以家庭和社区养老保障为基础,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为主体,商业保障为补充的养老保障体系。(3)培育农地流转市场,在成熟的农地流转市场下,推动农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调整农地种植方式,从而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改善农户生计。(4)破解限制农户农业投资和改善农户生计的不利因素更应该依赖于稳定农地产权、推动土地确权,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农户签订合同意识、规范农地流转合同;同时政府应加大农业公共投资力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产业。

参考文献:

[1] 朱建军,胡继连,安康,等. 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2): 49-58,111.

[2] 赵立娟,康晓虹,史俊宏.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8):158-162.

[3] Chambers R, 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M]. England: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2:296.

[4] Bebbington A. Capitals and capabilitie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peasant viability, rural livelihoods and poverty [J]. World Development,1999,27(12):2021-2044.

[5] 代富强,吕志强,周启刚. 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定量测度及动态分析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2014,30(26):114-122.

[6] 蔡进,禹洋春,朱莉芬,等.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研究——以三峡库区重庆市忠县天子村社区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4):143-147,153.

[7] 刘俊杰,张龙耀,王梦珺,等.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来自山东枣庄的初步证据[J]. 农业经济问题,2015(6):51-58,111.

[8] 张会萍,胡小云,惠怀伟. 土地流转背景下老年人生计问题研究——基于宁夏银北地区的农户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2016(3):56-67.

[9] 孙新华. 土地流转与农户家计:两种流转模式的比较——基于江西省 T 村的实证调查[J]. 贵州社会科学,2012(4):77-83.

徐 萌,石成玉. 媒介信任、信息属性与新兴农业生物技术的信息需求——基于 1 054 个消费者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J]. 江苏农业科学, 2018,46(23):431-435.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8.23.105

媒介信任、信息属性与新兴农业生物技术的信息需求 ——基于 1 054 个消费者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

徐 萌¹, 石成玉²

(1. 南京晓庄学院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7; 2.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云南昆明 650093)

摘要:以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为例,通过在线搜索和实地调研获取了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相关信息传播特征以及 1 054 份消费者调查样本,在梳理总结了我国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信息的传播特征基础上,实证分析了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公共媒介信息的信任程度、传播信息的认知和渠道对消费者信息需求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信息的易获得性和认知程度与消费者转基因信息需求之间存在显著关系,网络媒介和公众信任的信息传播主体将直接降低消费者对新兴农业生物技术的信息需求。最后提出,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信息的科普需建立安全信息交流平台,发挥网络和自媒体媒介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的重要决策,并通过良好的交流反馈改善转基因生物技术信息的不对称。

关键词: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信息传播;公共信任;信息需求;科技风险交流

中图分类号: F32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8)23-0431-05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与转基因相关的各种信息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公众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网络媒介等各种渠道了解转基因生物技术与食品的相关信息,而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的交叉传播也使得公众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存怀疑态度。

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等新兴生物技术的认知仍然匮乏,而传统媒介并不以生物技术科普作为信息传播目的。有学者对我国消费者转基因大米的态度进行调查,发现公众对转基因

生物技术的接受程度仍然偏低^[1]。学者将其归结为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缺乏了解,由于公众获取转基因生物技术信息的渠道有限,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认知处于匮乏阶段^[2],认为向消费者提供更多转基因生物技术信息,能增加消费者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接受度^[3]。然而,大众媒体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报道并不以科普为目的,新闻事实、新闻材料和新闻框架的组合有自由的选择权^[4],媒体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或其他特定目标而呈现出信息报道不足或信息有偏^[5]。相关调查显示,90%的消费者通过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和网络接收转基因技术与食品的信息,媒体对转基因技术日益激烈的争论已经影响到政府、企业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投资,制约了转基因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6]。潜在风险的广泛报道可能会降低消费者需求,如 1996 年英国政府宣布 10 例“克雅氏病”案例可能与疯牛病相关,次日整个欧洲牛肉销量大幅下跌,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都严禁英国牛肉及牛肉制品的进口,英国甚至欧洲的牛肉产业,几乎因此崩

收稿日期:2018-05-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编号:12YJC7902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673139、71303114)。

作者简介:徐 萌(1984—),女,河南卢氏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消费者行为、企业战略管理。E-mail: njxzu_xu@126.com。

通信作者:石成玉,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消费者行为。E-mail: njxzu_xu@126.com。

[10] Frischtak C.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reform in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R]. New York: World Bank, 1995.

[11] 贺雪峰. 论农地经营的规模——以安徽砀昌调研为基础的讨论[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1(2): 6-14.

[12] 朱建军, 胡继连. 农地流转对我国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3): 75-83, 124.

[13] 王春超. 农村土地流转、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 基于中国 17 省份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1(1): 93-101.

[14] 程 佳, 孔祥斌, 李 靖, 等. 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与农地流转关系研究——基于京津冀平原区 330 个农户调查[J]. 资源科学, 2014, 36(1): 17-25.

[15] 姚 洋. 中国农地制度: 一个分析框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2): 54-65, 206.

[16] 邵亮亮, 黄季焜, Scott R, 等. 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及其对农户投资的影响[J]. 经济学(季刊), 2011, 10(4): 1499-1514.

[17] 钟国辉. 农地征收、农地流转与农民人均收入——基于空间滞后模型估计[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16, 33(5): 44-49.

[18] 马贤磊, 仇童伟, 钱忠好. 农地产权安全性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农户参与——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2): 22-37.

[19] 匡远配, 唐文婷. 中国农业资本深化问题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10): 60-68, 111.

[20] 匡远配, 陆钰凤. 农地流转实现了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同步转型了吗[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11): 4-14.